
解读成都武侯祠的古柏

王晓乔 李迎春^{*1}

【摘要】:成都武侯祠最初的柏树本为诸葛亮和大臣们在惠陵陵园所种植，因杜甫“锦官城外柏森森”的诗句，千百年来受到保护、爱戴、吟赞，并逐渐被神化，成为武侯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承载着历代人们对诸葛亮品格、业绩的敬重、称颂。“柏森森”成了武侯祠的景观标识，古柏成为武侯祠的一种象征，一个文化符号。

【关键词】:成都武侯祠古柏；文化符号；景观标识

【中图分类号】:G122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:A **【文章编号】**:1008-0139(2017)06-0132-5

“丞相祠堂何处寻，锦官城外柏森森。”一千多年前，杜甫的诗句把武侯祠在森森古柏掩映下的情景展现在人们面前，从此古柏就与祠堂融为一体，受到官绅文人的追捧和咏赞，逐渐成为武侯祠的一个文化符号，成为武侯祠的景观标识并受到特别的保护。

这古柏何以能至此，本文拟一一加以解析。

一、从何而来，何人种植

有文献记载称，柏树来自蜀汉，“系孔明手植”。明人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说：“益州诸葛孔明庙中有大柏木，相传是蜀世所植。”^[1]清代《昭烈忠武侯庙志》引《儒林公议》云：“成都先主庙侧，有诸葛武侯祠。祠前有大柏，系孔明手植，围数丈。”^[2]不过，宋人田况的《儒林公议》原文是这样的：“成都刘备庙侧，有诸葛武侯祠。前有大柏，围数丈。”^[3]没有“系孔明手植”这几个字。

这古柏到底从何而来？如果是蜀汉时代所种植，那么，就真正有可能是蜀相诸葛孔明亲手所植。不过，如果是诸葛亮种植，他健在时自然不能修建自己的祠庙；自然不可能亲手种植这柏树。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要解答这个问题，就得追溯到刘备“惠陵”的修建。

刘备崩殂后，诸葛亮“乃顾遗诏，事惟大宗”^[4]，主持修建惠陵陵园及安葬事宜。刘备遗诏指示，丧事要按照大宗皇帝的榜样办理。大宗是西汉文帝刘恒的庙号。刘恒一生节俭，主张薄葬，曾下诏“治霸陵皆以瓦器，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，不治坟，欲为俭，毋烦民”^[5]。虽然霸陵“不起坟”，但“稠种柏树”于墓园^[6]。因此，遵照刘备遗诏，刘备的丧礼被简化，“惠陵”的封土堆也很小，诸葛亮和大臣们就在陵园种植柏树，以示缅怀。薄葬而种植柏树，也为诸葛亮自己所奉行。他临死遗命安葬定军山，“因山为坟”，人们也在他的坟地种植许多柏树。一百多年后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说：武侯墓已被“深松茂柏”所淹没^[7]。据说种植了54株柏树，以比喻他享年54岁。柏树现存22株，经鉴定为汉晋时所植^[8]。因此，惠陵陵园的古柏“系孔明手植”，应该有根据，不是空穴来风。

不知在何时，惠陵与先主庙旁，出现了一座武侯祠。成都的武侯祠最初位于“少城”，出现在西晋，是什么时候迁来或者

¹ 作者简介:王晓乔，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文博馆员；李迎春，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文博助理馆员，四川 成都 610041。

建于惠陵旁，为什么迁来或建于此呢？没有文献资料可考。学者们推测：可能其始迁或始建约在南北朝时期。对于为什么迁来或建于此，学者们认为：“把他们迁在一起，以良相伴明君，是对他们‘鱼水’君臣的赞许。”^[9]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。不过，将武侯祠迁于或建于诸葛亮亲手所植的柏树旁，以彰显他遵照遗命执政，彰显他的尽责、忠诚，同时也是对刘备“举国托孤”的肯定。这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
由于武侯祠建在惠陵旁，本是安葬刘备时诸葛亮和大臣种植在惠陵陵园的古柏，就成为武侯祠的古柏，造成孔明能在自己的祠堂种植柏树的疑惑。不过，明白了武侯祠是后来才建在惠陵旁的情况，而“武侯祠的古柏系孔明手植”就得到解释了。

因此，在历代诗人的吟咏中出现“手植劲松尚苍翠”（宋·陈荐《武侯祠》）、“汉代森森柏”（清·李维《武侯祠》）^[10]。所以，《庙志》增加柏树“系孔明手植”一句，学者也得出结论：是诸葛亮亲手种下的古柏^[11]。

二、武侯象征，文化符号

武侯祠与刘备的陵、庙毗邻，而三者又为森森古柏所簇拥，在唐代时便成为成都的奇特胜迹。人们来此拜谒、踏访时，敬重武侯，赞誉他与刘备的君臣鱼水情谊，往往借树怀人，古柏就成为他们怀念诸葛亮的情感载体。在历代赞颂诸葛亮的数以百计的诗文中，提及这古柏的就不少。以清代的《昭烈忠武侯庙志·艺文》所录诗文为例，直接以古柏为题的有10首（篇），而在诗文中咏及古柏的则达73首（篇）之多^[12]。

最先以古柏入诗的是杜甫，他在唐上元元年（760）踏访武侯祠写下的《蜀相》诗中，抓住“柏森森”来描绘武侯祠的景观特征。在夔州作《古柏行》时，又追忆成都武侯祠的古柏“崔嵬枝干”，赞其高大壮观。其后唐东川节度使杨汝士有“古柏森然地，修严蜀祠祠”诗句。

以古柏为题作诗始于李商隐，他于唐大中六年（852）来拜谒武侯时，写下《武侯祠古柏》一诗，曰：“蜀相阶前柏，龙蛇捧闕宫。阴成外江畔，老向惠陵东。大树思冯异，甘棠忆召公。”^[13]他引用古人借树怀人的典故，从古柏的姿态想到诸葛亮对刘备的忠贞，称颂他的业绩和恭良谦让的品德。

其后雍陶也写有《武侯庙古柏》一诗。诗曰：“宿叶四时同一色，高枝千岁对孤峰。此中疑有精灵在，会见盘根似卧龙。”^[14]古柏四季长青，高大挺拔，仿佛有灵魂，如卧龙诸葛亮再世。他也借树喻人。

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专门著《武侯庙古柏铭》，刻石立于祠内。铭文描绘了古柏的壮丽和神奇，表达了对诸葛亮的崇敬。文曰：“是草木，有异于草木则灵。武侯祠前，柏寿千龄。盘根拥门，势如龙形。含碧太空，散雾虚庭。合抱在于旁枝，骈梢叶之青青。百寻及于半身，蓄风雷之冥冥。攒柯垂阴，分翠间明。忽如虬螭，向空争行。上承翔云，孤鸾时鸣，下荫芳苔，凡草不生。古色天风，苍苍泠泠。曾到灵山，老柏纵横。亦有大者，莫之与京。于维武侯，佐汉有程。神其不昏，表此为楨。斯庙斯柏，实播芳馨。”^[15]

宋代著名学者田况（1003—1061）著《古柏记》曰：“成都诸葛孔明祠古柏，年祀寝远，乔柯巨围，蟠固凌拔，有足异者。杜甫尝作歌，段文昌亦作文，摹状瑰奇，人多谙诵。故老相传及记事者云。……因命工图写，备述本末，以贻好事者。自三分迄今，八百余龄矣。”^[16]他在描述古柏的雄奇和得到前人吟诵后，将古柏绘画成图，并记录其神奇经历，以备保存流传。

宋代陆游家藏有武侯祠古柏图，因而作《古柏图跋》。跋文曰：“此图吾家旧藏。予居成都七年，屡至汉昭烈惠陵，此柏在陵旁庙中，忠武侯室之南，所谓‘先主武侯同闕宫’者，与此略无小异，则画工亦当时名手也。淳熙六年（1179）龙集己亥六月一日，陆某识。”^[17]陆游讲述了古柏的具体位置，介绍了他的古柏图出自名家之手。

至于吟及古柏的诗文，更是多得不胜一一例举。如：

唐代裴度的《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》文中有“古柏森森，遗庙沉沉”；宋代任渊的《重修先主庙记》、明代张时彻的《诸葛武侯祠堂碑记》描写刘备陵庙与武侯祠的环境时说：“老柏参天，气象甚古，诗人尝为赋之”。他们都特别提到这森森古柏。

宋人刘光祖在《万里桥记》中，把武侯祠直接称为古柏祠堂，说：“侍御赵公之镇蜀也，始至，谒古柏祠，即命葺之”。

明人薛瑄的《诸葛武侯庙》诗曰：“欲问祠堂何处是，锦官城外柏森森。”明人刘希尹的《先主武侯祠次杨瑞虹司马韵》曰：“不尽成都柏，来寻丞相祠。”清人温瑞柏的《谒武侯祠》诗称“古柏森森处，祠堂傍锦官”；清人金伯纶的《武侯祠》诗说：“卧龙何处去，古柏问祠堂”。他们都把古柏作为武侯祠的象征，或者以古柏代指武侯祠。

成都武侯祠古柏甚至影响到其他诸葛亮的纪念地，成为其景点。明代王越维修襄阳隆中草庐，同时设置十处景点。其中即特别增设“古柏亭”。修好后他作《隆中十景·古柏亭》诗曰：“锦官城外柏森森，几度曾歌杜甫吟”，点明修亭的缘由。同样，南阳卧龙岗武侯祠的“卧龙岗十景”中也有“古柏亭”^[18]。

历代官绅文人纷纷以古柏入诗、著诗，以古柏入文、为记，以古柏刻石、入画。古柏被赋予灵气，喻为诸葛亮的化身；古柏与武侯祠被视作一体，作为成都武侯祠的代名词。因此，古柏“刻上了深深的武侯‘烙印’，成为成都武侯祠的一种象征，一个文化符号。”^[19]

三、赋有灵气，故事神奇

历代文人雅士诗人从杜甫开始，在吟赞武侯祠古柏的同时，纷纷赋予其灵气，并逐渐将其神化。

如杜甫的“扶持自是神明力，正直元因造化功”；雍陶的“此中疑有精灵在，会见盘根似卧龙”；段文昌的“盘根拥门，势如龙形。含碧太空，散雾虚庭。……于维武侯，佐汉有程。神其不昏，表此为楨。斯庙斯柏，实播芳馨”等，称颂古柏的神奇。

宋人范镇的《武侯庙柏》诗曰：“满叶是清霜，培根无沃土。耻作秦皇松，宁为冯异树。英灵自有风，荫蔚长如雨。”^[20]他将古柏拟人化，赋予儒家正统的道德观念。田况《古柏记》记载：故老相传及记事者云：“自唐季凋瘵，历王、孟二伪国，蠹朽尤甚。然以祠中树，无敢翦伐者。皇朝乾德丁卯岁仲夏，枯柯复生，日益敷茂，观者叹耸，以谓荣枯之变，应时治乱。武侯光灵，如有意于兹者，诚为异哉！”^[21]传说在唐末因前后蜀的分裂割据，古柏渐枯，宋时巴蜀归一统后复生枝叶，以古柏“荣枯之变，应时治乱”。人们赋予古柏以维护儒家正统的政治色彩，能预兆太平治世，而且是诸葛武侯的英灵光芒所致。

明人刘廷诏的《谒武侯祠》诗说“古柏围三径，崇岗护百灵”；清人姚瑩的《武侯祠》诗中有“肃肃灵旗拂闾宫，苍苍古柏映遥空”；清人徐本衷的《祠堂古柏》诗曰：“祠堂古柏旧垂名，开元老杜倍关情。森森耸翠争凌拔，落落盘踞讶神明。”文人雅士在颂扬诸葛亮把他推向圣人、神人的同时，也没有忘记神化这古柏。

同时，关于古柏的民间传说在宋明时代也多起来。如《游梁杂钞》记载说：“嘉靖中，建乾清宫，遣少司马冯清求大材于蜀地，至孔明庙，见柏，谓无出其右，定为首选。用斧削去其皮，朱书‘第一号’字。俄聚千百人斫伐，忽群鸦无数，飞绕鸣噪，啄人面目。藩臬诸君皆力谏，遂止。命削去朱书，深入肤理，字画灿然。”^[22]明代嘉靖年间，有个叫冯清的官员，到蜀地为京城修建乾清宫择选良木，欲砍取武侯祠的古柏，却被空中突降的群鸦啄咬而被迫放弃。古柏已被蜀地百姓视为神树，任何人不可妄动。

神奇的古柏还能造福于百姓。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特别提及以“古柏叶尤奇，益州诸葛孔明庙中有大柏木，相传是蜀世所植，故人多采以作药，其味甘香异常也”^[23]。相传诸葛时代种植的古柏叶可作药，味甘香，人们争而采之。古柏的神奇正式明确地载入医书。

这些关于古柏的种种比拟称颂和故事传说，从不同角度，不同层面传递出忠奸、善恶、正伪、治乱的情感和观念。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对古柏作为植物的认识，它被视为诸葛亮的化身，仿佛为诸葛亮灵魂所依附，传递出诸葛亮的情感。

四、景观标致，受到保护

成都武侯祠古柏因历代文人雅士的吟咏、题记、画图，影响深远而广泛，因此历代人们对古柏倍加爱护、珍惜。据“陆游记：唐节度取孔明祠柏一小枝为手板，书于图志，今见诽谤”^[24]。唐代一位节度使从古柏上取下一树枝做手板记事，遭到后人的非议批评。

遗憾的是，武侯祠在明末的战火中被毁，森森古柏枯萎不存。但是，古柏已经融入武侯祠，成为了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；柏森森已“成为武侯祠之一大胜景，同时也使后来祠庙园林的维护、建设有了一个文化定式。”^[25]所以自清康熙年重建陵庙祠堂始，人们都不断在祠庙补种柏树，以期重现“柏森森”的景象。

清人徐本衷著《种柏记》，表达了这一心情。他说：“衷寄迹丞相祠三十余年矣。每读少陵‘柏森森’之句，辄瞻仰遗像，神游蜀汉焉。慨自明末献贼之毁，寸木无存。国朝重建以来，至雍正初，吾七世祖子还公暨先师指实公，先后于昭烈殿、丞相祠前，种柏三十株。比年以来，已蔽日干霄，差补当年之百一。然衷之私心犹未已也。今乾隆五十三年，蒙上宪重修陵庙，因复于惠陵前种柏七十七株，陵庙二门外种柏八株。睹兹新枝挺秀，蔚然可观，他日黛色参天，霜皮溜雨，庶几继美于前尔。是为记。”而且，祠内还保存有清嘉庆丁卯年（1806）的《种柏记》石碑，记述了当时补植柏树的情况，并称植柏“为守土者之责”^[26]。

而《昭烈忠武侯庙志》则专章详细记录了清代重建后历年补种柏树的情况，说：“国朝康熙十一年，四川臬使胶州宋可发重修陵庙，于前殿补种柏，今计成材者十一株。乾隆七年，住持道人张清夜于后殿补种柏，今计成材者十一株。乾隆三十九年，住持道人唐复雄于后殿补种柏，今计成材者十九株。乾隆五十三年，住持道人徐本衷于陵前补种柏七十七株，又于陵庙大门内补种柏八株，今俱已成材。道光三年，住持道人张合桂于惠陵前近墙补种柏四十株，又于庙后墙外辟地为园，补种柏一百株。道光六年，大宪培修惠陵，工竣，复于缭垣内补种柏二十余株。”^[27]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、乾隆七年（1742）、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、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、道光三年（1823）、道光六年等历年补种柏树的数目，以及成活多少，均一一记录在案，这足以说明柏树在武侯祠的重要地位。

现今的武侯祠管理者，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，也继续补种柏树；并在管理机构中设立专门的部门，管理养护柏树。如2002年进行大量的补植，但补植的柏树长势较弱。于是，2014年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柏树补植工作。为了保证成活率，事先在专业柏树种植和管理人员的指导下制定了柏树补植方案，然后实施。这次共种植柏树290株，次年9月又补植95株。这些补种的柏树，经过科学养护，生长状况良好。

成都武侯祠最初的柏树本为诸葛亮和大臣们在惠陵陵园所种植，由于武侯祠迁建于此后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千百年来受到保护、爱戴、吟赞，并被神化，承载历代人们对诸葛亮品格、业绩的敬重、称颂。“柏森森”成了武侯祠的景观标识，古柏成为武侯祠的一种象征，一个文化符号。世事沧桑，千百年来古柏虽有兴废，它却永远留在诗文中，绘于画图里，镌刻在碑碣上，长存于人们心间。而近年补种的柏树在精心养护下日渐葱茏，正延续着，传递出人们对古代先贤诸葛亮的缅怀、称颂。

参考文献：

-
- [1] 李时珍. 本草纲目（卷三十四）[M]. 四川大学出版社, 2014. 823.
- [2][24] 潘时彤著, 李景焉, 卿三强笺注. 昭烈忠武陵庙志校注·花木（卷二）[M].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2. 37.
- [3] 朱易安, 傅璇琮等主编. 全宋笔记（第一编第五册）·儒林公议[M]. 大象出版社, 2014. 131.
- [4] 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（卷三十二）[M]. 中华书局, 1959. 891.
- [5] 史记·孝文本纪（卷十）[M]. 中华书局, 1959. 433.
- [6] 惠焕章主编. 陕西帝王陵·汉文帝刘恒霸陵[M]. 陕西旅游出版社, 2000. 58.
- [7] 王国维校注. 水经注校·沔水（卷二十七）[M]. 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84. 877.
- [8] 张东. 阳平关口说三分·武侯墓价值初探[M]. 三秦出版社, 2016. 68.
- [9][11] 谢辉等主编. 三国胜地武侯祠·第一章·三国圣地 明良千古[M]. 四川科技出版社, 2007. 13, 17.
- [10][12] 潘时彤著, 李景焉, 卿三强笺注. 昭烈忠武陵庙志校注·艺文[M].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2. 178, 200, 162—368.
- [13] 全唐诗（卷五百三十九）[M].
- [14] 武侯庙古柏[A]. 全唐诗（卷五百十八）[C]. 6162.
- [15] 潘时彤著, 李景焉, 卿三强笺注. 昭烈忠武陵庙志校注·花木（卷二）[M].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2. 38; 全蜀艺文志（卷四十九）[M].
- [16] 杨慎编, 刘琳, 王晓波点校. 全蜀艺文志（下册）[M]. 北京线装书局, 2003. 1228.
- [17] 陆游著, 马亚中, 涂小马校注. 渭南文集校注（卷二十六）[M]. 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5. 167, 168.
- [18] 王瑞功主编. 诸葛亮研究集成·诗词曲赋卷[M]. 齐鲁书社, 1997. 1022, 1185.
- [19] 吴娟. “柏森森”为何成为武侯祠的标识景观[A]. 走进成都武侯祠 100 问[C]. 成都时代出版社, 2015. 275.
- [20][21] 袁说友等编, 赵晓兰整理. 成都文类[M]. 中华书局, 2011. 108, 878.
- [22] 诸葛亮集·故事·遗迹篇（卷五）[M]. 中华书局, 1960. 243.
- [23] 李时珍著. 本草纲目（卷三十四）[M]. 四川大学出版社, 2014. 823.
- [25][26] 谢辉等主编. 三国胜地武侯祠[M]. 四川科技出版社, 2007. 281, 230.

[27] 潘时彤著，李景焉，卿三强笺注. 昭烈忠武陵庙志校注·花木（卷二）[M].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12. 38；成都武侯祠的古建与园林[M].